

《史匯》
第十期，頁 321 - 346
二〇〇六年九月
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暗流洶湧：馬來亞社會運動發展(1900-1941)

林慧婷*

中文摘要

從未是民族國家的馬來西亞，在面對英國殖民的態度上展現多元分歧的立場，半島上馬來人地域性的認同與個人效忠，加上來自其他國家的印度人、華人隨身攜帶而來的祖國傾向民族情感，使得現代所指的具有統一性質的民族主義，對二戰結束以前馬來半島上的馬來族、華族與印度族而言，是一種相當陌生的概念。當英國擅用分而治之的殖民技倆來統治馬來半島的族群，更加速族群間的區隔與對立。它嚴重影響馬來亞獨立建國以後上台執政的馬來人，在樂觀地著手創造一套國家意識，以便進一步建立民族認同，最後達成族群整合的目標時，遭遇各族群不同的國家意識以及強烈族群屬性的政治思維的挑戰，引爆族群發生對抗和衝突等國家整合的一連串危機。而引爆這一連串危機的活躍份子當屬馬來西亞社會中各類左派團體領導的社會運動。

為了徹底而全面地對這類與執政當局相對立的左翼社會運動有所了解，本文嘗試分析二次戰前馬來半島在英國殖民政策操作之下馬華社會的變遷，再從馬華社會變遷來探討馬華族群產生的「警覺意識」，及因「警覺意識」而形成的各類民族性質的活動內容、歷史意義。

關鍵詞：社會運動、反殖意識、伊斯蘭、馬共

*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研究生

- 一、前言
 - 二、英國殖民統治
 - 三、英國殖民統治下的馬來亞社會
 - 四、戰前馬來亞社會運動的發展
 - 五、結論
-

一、前言

當英國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開始在 19 世紀的印度、錫蘭、緬甸與馬來半島根植，均遭到本土住民在民族主義本能上的反抗與暴亂時，唯獨馬來半島上的地方領袖極欲投向英國殖民主義者的懷抱，以增強消滅敵人的力量。研究帝國主義的歷史學家 Victor G. Kiernan 認為「當時的馬來仍是個封建社會，所以沒有像緬甸一樣的中央與群眾的對抗；此外，緬甸是民族國家，馬來就同回教世界一樣，它還不是個民族國家。」¹。如同 Kiernan 所指的馬來不是個民族國家一樣，半島上馬來人地域性的認同與個人效忠，加上來自其他國家的印度人、華人隨身攜帶而來的祖國傾向民族情感，使得現代所指的具有統一性質的民族主義，對二戰結束以前馬來半島上的馬來族、華族與印度族而言，是一種相當陌生的概念。

馬來半島上的族群除了缺乏對馬來半島這塊土地一致的認同，境內還因為強烈的族群意識與多元宗教文化的環境，以及種族之間有各自支配的經濟活動領域，如馬來人多居鄉村從事農業活動、城市多居住從事商業的華人與從事勞工活動的印度人，²凡此種種因素皆使得印、華、巫族群間要產生大規模結合相當不易。當英國擅用分而治之的殖民技倆來統治馬來半島的族群，更加速族群間的區隔與對立。它嚴重影響馬來亞獨立建國以後

¹ Victor G. Kiernan 著、陳正國譯，《人類的主人—歐洲帝國時期對其他文化的態度》，台北：麥田，2001，頁 135。

² “Malaya’s Race Problem,”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XXIV:9, 1958, p. 278.

上台執政的馬來人，在樂觀地著手創造一套國家意識，以便進一步建立民族認同，最後達成族群整合的目標時，遭遇各族群不同的國家意識以及強烈族群屬性的政治思維的挑戰，引爆族群發生對抗和衝突等國家整合的一連串危機。

如果說掌握了殖民者歸還的政治權力的馬來人想以種族主義的心態來支配國家經濟、教育等方面的權利，以彌補他在政治以外的不足，確保馬來族群的地位與權益。那麼馬來人這種對其它非馬來族群「警覺」式的種族民族主義必定在英國殖民時代孕育發展。然而，一項「警覺」的衍生必定是先意識到「他者」的存在，而後進一步意識到馬來社會存在「衰弱」的現象，最後意識到「他者」的威脅與壓迫，因而一種須要進行有效改革馬來人的生活，獲取領導地位的想法便產生了。³而馬來社會中出現的這股警覺意識如何激起？形成的原因為何？這股由馬來人自發性的力量是屬於什麼樣的性質？又是如何發展呢？同樣的，民族情感與民族認同牽繫著祖國的華人、印度人族群，在面臨英國殖民統治時，他們的「警覺意識」又如何促使他們發展出何種形式的民族性活動？

因此，本文嘗試分析二次戰前馬來半島在英國殖民政策操作之下馬華社會的變遷，再從馬華社會變遷來探討馬華族群產生的「警覺意識」，及因「警覺意識」而形成的各類民族性質的活動內容、歷史意義。至於印度族群在本文不列入討論，根據曾經為英國殖民時期負責華人事務的維多巴素博士指出，半島上三大族群印、華、巫的人口比例在 1911 年的百分比為巫人 49.2%、華人 35%、印度人 14%，到了 1941 年馬來亞抗日戰爭前夕巫華印所佔比例依序為 41：43：14。⁴從 1911 年及 1941 年三族人口比率，可知馬華為半島上主要的兩大族群，印度人一直數於少數，因此本文不在此討論。

³ Khoo Kay Kim, *Malay Society-Transformation & Democratisation*, Malaysia: Pelanduk Publication, 1995, p.178.

⁴ Victor Purcell 著、張奕善譯，《近代馬來亞華人》，台北：商務，1967，頁 19。

對於馬華各類民族性質的活動於本文將使用「社會運動」一詞概稱，使用「社會運動」的概念也就同時意味著本文對馬華民族性質活動討論範圍的限定。

「社會運動」於社會學有相當豐富的研究案例，其理論的建構也不斷在更新，但是對於基本定義的界定是一致的。根據 Robert D. Beaford, Timothy B. Gongaware, Danny L. Valadez 的界定是「一群人企圖去促進或抵抗某個社會或團體改變的集體目的。其達成集體目的的方式，某些運動訴諸全面性、革命性的改變方式，有的則訴諸溫和穩健的改革方式。」⁵研究義大利社會運動的學者 Sidney Tarrow 指出「社會運動是一種連續的集體挑戰行爲，由一群彼此團結的人民所發動，共同目的在於改變現狀。」⁶台灣社會學者何修明認為「社會運動是一種有意識的人爲介入，由某一群人試圖推動或者是阻撓某一種形式的社會變遷。」⁷歸納上述的界定，本文所理解的「社會運動」應是具有共同訴求的一群人聚在一起活動，其訴求的源起是針對所生存的社會某些現象，企圖透過激進或溫和的活動方式，去徹底改變或改革某種社會現象，達到他們期望的目的。

而社會運動的類別依照性質來分可歸納爲兩類，一類是革命性運動，對現存的正統政權形成顛覆威脅；一類是改革性運動，不對現存正統政權挑戰。據 Beaford, Gongawar 與 Valadez 對社會運動的形式界定：「一爲革命性運動如布爾什維克共產革命、伊斯蘭護教戰爭、愛爾蘭共和運動等都是尋求基本結構的改變，這類運動常訴諸社會制度激進的改變，甚至是世界秩序的改變。因爲這類團體挑戰尚存在執政者、權力精英的正統性，通常使用暴力來表達革命運動。另一類是改革性社會運動，它企圖以不會威脅已存在的體制的方式來表達不滿與反對，這類改革性社會運動者會反對某

⁵ Edgar F. Borgatta, Rhonda J. V. Montgomery,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 New York: Macmillan Reference, 2000, p. 2717.

⁶ Sidney Tarrow,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Collective Action and Politic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1994, pp. 3~4.

⁷ 何修明，《社會運動概論》，台北：三民，2005，頁 200。

項改革，但對革命運動的容忍少於對改革性的運動的容忍。另有一些社會議題的改革性社會運動，如反墮胎、反酗酒等具有特殊焦點的運動，相較於革命性與改革性運動，這類重點在於改變個人。」⁸關於針對某種社會議題而發起的現代性社會運動並不是本文想要探討的類型。

但是，社會運動的參與並非只是中下層階級的範疇，有時屬優勢團體的資產階級、統治階級也會透過社會運動來爭取利益。如拉丁美洲社會學者 Daniel Camacho 就認為「社會運動包含那些代表人民利益的，以及那些集合資本主義體系中的統治階級的運動，這些統治階級只對符合自身利益的部份改革感到興趣。所以，社會運動有兩個主要面向，一方面它代表上層團體的利益，另一方面則表達了群眾團體的利益，後者便是我們認為的羣眾運動。」⁹。優勢團體倡導的體制外社會運動(靠著人情關、關說、遊說來保障自己的權益)，並不在本文要討論的類型，本文焦點急中於中下層的社會運動，也就是 Camacho 說的羣眾運動。

因此，假設馬來半島戰前在英國殖民統治之下，社會出現了讓中下層馬華兩個族群感到不滿且想要改變的現象，故基於一定程度的認同而聚在一起形成一股具體的力量，以革命性或改革性手段來表達意見與實踐目的。那麼，促使馬華族群發展社會運動的原因、社會運動中成員的意識、認同、訴求，以及運動本身的性質、意義等都是本文急欲探討的，以期能對戰前馬來半島上的非上層優勢團體的社會運動有所認識。

二、英國殖民統治

馬來西亞，是 1963 年成立「馬來西亞聯邦(the Fedrtation of Malaysia)」

⁸ Edgar F. Borgatta, Rhonda J. V. Montgomery,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 New York: Macmillan Reference, 2000, p. 2717.

⁹ 轉引自郭昌泰，〈1973 年至 1986 年智利社會運動之研究〉，台北：淡江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頁 10。

的簡稱。在這之前稱為馬來亞，1957 年脫離英國殖民統治而獨立。「馬來西亞聯邦」包含馬來半島、新加坡（Singapore）、東馬的沙巴與砂拉越、納閩島（Labuan），新加坡在 1965 年獨立出去。

本部份將分成英屬馬來亞的形成、分而治之的統治政策要討論英國對馬來半島建立殖民統治的過程與政策，以明白戰前馬來社會與華人社會變遷的背景。另外，會談及二戰結束後英國返回馬來亞的殖民策略，來與戰前的殖民政策作比較。

（一）英屬馬來亞的形成

英國在馬來半島的活動，是從商業利益為出發點。1786 年，英國萊特上尉（Francis Light）以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身份，從吉打（Kedah）蘇丹獲得一紙租地契約，永久租用檳榔嶼。¹⁰1819 年，英國萊佛士爵士（Stamford Raffles）開闢新加坡，1824 年麻六甲也由英國取得，1826 年檳榔嶼（Penan）、新加坡、麻六甲（Melaka）被合併為「海峽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 SS）」，由遠在印度的英國殖民當局控制。¹¹海峽殖民地是華人聚集的地區，也是馬來群島中重要的商貿港口。

而英國勢力向馬來半島上的擴張，從 1874 年 1 月 20 日英國總督 Andrew Clarke 與霹靂（Perak）蘇丹 Raja Abdullah 簽定的「邦喀條約」（Pangkor Treaty）開始，Raja Abdullah 允許英國總督有權處理宗教與習俗之外的所有問題，並接受英國保護。¹²邦喀條約的簽定，給英國人干預馬來半島事務一個開端。緊接著，1878 年森美蘭（Negri Sembalan）、雪蘭莪（Selangor）也接受英國保護，到 19 世紀 80 年代以後，因為德國在太平洋地區大肆活動，以及法國佔有越南、柬埔寨與寮國，讓英國深感威脅，促使倫敦的英國當局急欲擴大在馬來半島的勢力，開啓英國所謂的「前進運動」。¹³在英國向各

¹⁰ Victor Purcell 著、張奕善譯，《近代馬來亞華人》，台北：商務，1967，頁 6~7。

¹¹ Nicholas Tarling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Volume Three,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0~30. Barbara Watson Andaya and Leonard Y. Andaya, *A History of Malaysia*, Palgrave, 2001, p.126.

¹² Barbara Watson Andaya and Leonard Y. Andaya, *A History of Malaysia*, Palgrave, 2001, p.158.

¹³ Barbara Watson Andaya and Leonard Y. Andaya, p.168.

馬來邦國統治者（蘇丹）以「顧問」的身份，提供馬來蘇丹「應該」實行的「建議」，英國不處理跟宗教有關的任何事務，並隨時保護該邦國的安全等雙方的協調之下，「前進運動」的推展，不斷由馬來半島的西邊海岸向內陸各馬來邦國推進。1888年彭亨（Pahang）接受英國保護，1896年霹靂、森美蘭、雪蘭莪、彭亨合併為「馬來聯邦（Federated Malay State, FMS）」。

而英國持續推展「前進計劃」過程中，北方馬來邦國如吉蘭丹、丁加奴（Trengganu）、吉打、玻璃市的取得，主要源自1909年暹羅（Siam）國王朱拉隆功（Chulalongkorn）的轉讓，原因是為免除英國在國境內擁有的治外法權與對四個馬來邦國似乎不忠的懷疑。¹⁴北方馬來邦國的取得，使英國對德國的南侵憂慮稍加緩和。1914年，柔佛也受英國保護，1919年吉蘭丹（Kelantan）、丁加奴、吉打、玻璃市（Perlis）與柔佛（Johore）組成為「馬來屬邦（Unfederated Malay State, UMS）」，至此，英屬馬來亞於焉形成。

（二）分而治之的統治政策

二次大戰前英屬馬來亞之下的海峽殖民地、馬來聯邦、馬來屬邦代表著三種不同的政體。海峽殖民地由英國直接統治，英國在馬來聯邦施行「參政制度（the Residential System）」、在馬來屬邦設立「顧問官（Adviser）」採間接統治政策。

海峽殖民地為英國直接統治的地區，也是華人的聚居較密集的地方，故派設一位總督（Governor）管轄轄內的內外事務，直接向倫敦殖民司負責。總督之下設置行政政務會（Executive Council）和立法政務會（Legislative Council），來協助總督。行政政務會全由英國人擔任成員，華人的直接參與是1930年以後的事。¹⁵立法政務會的成員同行政政務會一樣，英國人佔了大多數的比例，華人與歐人官員相比之下，並未扮演重要的角色。¹⁶

「參政司制度（the Residential System）」在馬來聯邦的採行，為一種間

¹⁴ Barbara Watson Andaya and Leonard Y. Andaya, p.200.

¹⁵ C. F. Yong and R. B. McKenna, *the Kuomintang Movement in British Malaya 1912~1949*,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44~47.

¹⁶ Oong Hak Ching, *Chinese Politics in Malaya 1942~1955*, Malaysia: Bangin, 2000, p.36.

接統治的概念。原則上，它保留每個州原已存在的風俗習慣和傳統，參政司（Resident）對馬來統治者擔任「建議者」的角色，從旁「指導」與「建議」馬來國王以州政務會（state council）取代以往的宮廷，州政務會由英國參政司、馬來國王、挑選的親王貴族、地方族長、華人代表組成，其中參政司有支配州政務會權力。¹⁷馬來聯邦的中心行政區域設於吉隆坡（Kuala Lumpur），由總參政司（Resident-General）統領，對聯邦四州的駐在官有監督權，各州無論稅收、法律秩序的維持與司法審判，統一由總參政司領導，各地方參政司負責執行。¹⁸

英國在馬來屬邦主要充份利用馬來蘇丹在宗教上具最高威望的權力效力，獲得高度控制馬來人的成效。¹⁹原來在二戰以前，英國對馬來人始終維持幾項原則：如各州主權取決於馬來蘇丹，不去碰觸與馬來社會宗教、習俗有關的事務，視馬來人爲本土住民，促進與保護馬來人權益的責任等。²⁰英國對馬來人的統治，以維護自身經濟利益爲基本原則，著重對馬來屬邦首領作攏絡，予以各邦首領自主的行政權，並在行政權之外積極拉高首領在宗教上無與倫比的神聖地位，同時給與各邦首領莫大的經濟互惠，藉這種處處給好處與榮耀的方式，英國殖民統治者省了不少政治資源的付出，輕鬆即可透過馬來土著首領的效忠，而獲得大部份馬來人的臣服。如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各土著首領爲了慶祝英國勝利，吉打與柔佛州的蘇丹就贈送英國飛機當賀禮；1915年柔佛州蘇丹也幫助英國主動的鎮壓了在新加坡的軍事叛亂。²¹而且，基本說來，馬來人口流動率低，他們也很少參與城市地區的活動，維持基本的糊口經濟生活，他們對於城市與政治一無所

¹⁷ Barbara Watson Andaya and Leonard Y. Andaya, pp.174~176.

¹⁸ Barbara Watson Andaya and Leonard Y. Andaya, p.186.

¹⁹ Khoo Kay Kim, *Malay Society-Transformation & Democratisation*, Malaysia: Pelanduk Publication, 1995, p.162.

²⁰ Cheah Boon Kheng, *Red Star over Malaya: Resistance and Social Conflict during and aft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1941~1946*,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15~16.

²¹ Simon C. Smith, *British Relations with the Malay Rulers from Decentralization to Malayan Independence, 1930~1957*,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uala Lumpur, 1995, pp.15~19.

知，很類似中國農村社會，而廣大鄉村馬來人也都接受蘇丹所擁有的神聖地位。

由這些英國殖民當局面對馬來人的原則，可看到「馬來人的馬來亞」意識正由此培養起來，加深馬來人對華人與印度人的排斥。英國也透過這些原則，使馬來蘇丹等上層統治階級與殖民者的關係和諧並密切結合，利益一致，相對的，卻也讓馬來上層統治階層與其它階層產生隔閡。

英國在戰前英屬馬來亞施行三種不同的政治體制，讓馬來屬邦與馬來聯邦馬來人的君王制保持獨立自主，並始終維持「馬來優先」(pro-Malay)政策為原則，因此任何印度人或華人企圖改變這種政體，或爭取民族權益之行動，必會遭到許多馬來人的抵制；而且，華人往往被描繪成親中國的形象，也避免了馬來人和華人之間的結合。²²如此不同的三種政體，除了在地域上區隔了馬來人與非馬來人的活動範圍，也區隔了馬來人與非馬來人在經濟活動上的結構。更重要的是，英國以「馬來優先」為原則的政策，以及刻意對華人、印度人是「親向母國認同」的形象塑造，加強馬來人以「主人」自居，也加深馬來人自認應享有特權的意識。從馬來亞獨立後的1958年首相東姑拉曼(Tengku Abdul Rahman)一再強調：「在整個國家的利益上，內部族群應該合作。但合作的一個基本概念是，這塊土地上真正的主人將是馬來人，這概念必須深植想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每個外國人心中。」²³，這段談話透露出來的馬來人至上的認知與意識之根深蒂固可見一般。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英國有感戰前體制將馬來亞全境分為馬來屬邦、馬來聯邦與海峽殖民地三部份，對英國殖民政府在事務的處理上頗不方便，故於1946年提出「馬來亞聯邦(Malayan Union)」計劃，欲以各民族平等原則實行中央集權的統治。²⁴但是馬來亞聯邦計劃公布後隨即遭受馬來社會強烈的不滿與反抗，但華人社會甚至馬共都予支持，然而英國終

²² Oong Hak Ching, *Chinese Politics in Malaya 1942~1955*, Malaysia: Bangin, 2000, p.41.

²³ "Malaya's Race Problem,"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XXIV:9, 1958, P.278.

²⁴ 李亦園，《一個移殖的市鎮—馬來亞華人市鎮生活的調查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70，頁21。

究還是依循戰前馬來優先政策，將馬來亞聯邦計劃代之以符合馬來至上原則一致的「馬來亞邦聯計劃（Federation of Malaya）」。

三、英國殖民統治下的馬來亞社會

英國在殖民馬來亞時期刻意分化族群的統治政策，給馬來亞留下深刻的影響。這些影響在馬來亞政治、經濟與社會的結構有深刻反應。

（一）多元族群社會結構

就印、華、巫三者的人口比例之變化而言，1901年在全馬來亞人口總數 1227195 當中，有 48% 是華人，9% 是印度人，印華人口比率相加才能超越馬來人口比率；在 1911 年時候，印華人口比率合加起來不過 45%；到 1941 年，印華人口已經到達 58%，與馬來亞淪陷之前的印華巫人口比率呈現倒轉現象。²⁵根據楊進發的看法，他認為這種現象正說明馬來人與非馬來族群人數相當平衡，同時也反映這三種群體並沒有同化的現象。²⁶在英國以發展馬來亞殖民經濟為主題的政策之下所大量引進的印度與華人勞工，因為地緣、職業、階級、語言、宗教、教育等背景而各自形成派系組織，加深馬來亞異質性社會的複雜化。

英國殖民統治下的馬來亞戰前政治體制，全境分為馬來聯邦（FMS）、馬來屬邦（UMS）以及海峽殖民地（SS）三部份，三種不同政治體制的實行，是有利於英國的統治。因為讓馬來人保有獨立自主的君王制，可以對數量正在迅速成長的華人或印度人欲改變政治現狀以及爭取政治權利的企圖有所抵制。再者，戰前的馬來亞是個充斥異質性的多元文化社會，三個主要群體—印、華、巫之間在經濟結構、種族文化的差異明顯加劇，英國可以藉由擔任三者糾紛之仲裁者而維持其統治，同時也因為華人親中國的

²⁵ Ooi Jin-bee, *Land, People and Economy in Malaya*, Longmans, Green and Co Ltd, London, 1964, pp. 103~125.

²⁶ C.F. Yong, *The Origins of Malayan Communism*, South Seas Society, Singapore, 1997, pp. 1~2.

民族意識，避免馬來人與華人有結合的機會。²⁷英國這種分而治之的統治方式，加深馬來人與非馬來人之間的隔閡。

（二）政治經濟二元結構

由於英國是政治上長期以馬來人爲優先而壓制華人的殖民政策，並在 1957 年將權力移轉給馬來政治精英，馬來亞形成馬來人主掌政治、華人主控經濟的局面。主要是馬來人大都居住在農村地區，少數馬來精英控制聯邦及州政權，特別是西馬地區的巫統（UMNO，由馬來人組成的政黨，也是 1974 年國家陣線的核心政黨），而華人大都居住在城市地區，從事商業活動，掌握相當大的經濟力量。²⁸

（三）馬來至上的本土意識

馬來人爲扭轉這種二元結構對種族利益存在的威脅，乃透過威權民主統治，來提升保障馬來人在各方面的地位。然而，多元種族社會在處理利益分配的問題上，往往並不順利。因爲族群在長期遭到分化而互不融合的情境下，必須通過族群之間互相協商、包容的共識，建立一套各族群分享權力的國家體制，以求政治穩定。²⁹然而馬來人以「馬來至上」強制同化的企圖以及華人反同化的行動，還是使 1963 年以後的馬來西亞遭遇了國家政治穩定的危機和挑戰。如 1967 年檳城華人抗議以馬來語作爲國語，發生暴動流血事件；1969 年 5 月初大選，華人以選票表達對執政者的不滿，支持左派色彩的反對黨(社陣)，引發馬來人的敵視，發生「513」的族群流血衝突事件。³⁰

特別在 1969 年「513 事件」的族群流血衝突發生後，大馬政府除實施內部安全法令(Internal Secure Act)加以箝制反政府活動，³¹尤其是華人；第二

²⁷ Oong Hak Ching, *Chinese Politics in Malaya 1942~55 – The Dynamics of British Policy*, Penerbit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Bangi, 2000, p.41.

²⁸ 陳鴻瑜，《東南亞各國的政治與外交政策》，台北：渤海堂，1992，頁 190。

²⁹ 蔡源林，〈從伊斯蘭法的公共論述看馬來西亞社群主義的建構〉《亞太研究論壇》，第 23 期，2004，頁 15~36。

³⁰ 陳鴻瑜，《東南亞各國的政治與外交政策》，台北：渤海堂，1992，頁 190~191。

³¹ ISA 附予警察可以不用任何証據、理由，隨時逮捕被認為有煽動反政府嫌疑的權力。1983

任首相拉薩克 (Tun Abdul Razak) 推出三大影響深遠的政策：「國家政策」、「新經濟政策」、「國家文化政策」，後兩項政策以強勢姿態對華人利益造成嚴重衝擊。³²例如：自從 1971 年教育法令欲把國立華文學校改為馬來語學校之規定頒佈後，華文教育的保存一直是華人社會相當關注的問題。華人社會代表華文教育的組織不斷反抗政府企圖施行馬來教育的政策。1000 多名支持教育法令的巫統青年團團員與堅持維護華文教育的華人政黨、教育組織在天后宫對峙，馬華族群關係的危機至 1987 年達到臨介點，大有重演 1969 年「513 事件」種族衝突之可能。³³1975 年 4 月「工業協調法令」的通過，它規定凡製造商須擁有一個有效的製造業執照，方能生產產品；執照的申請，貿工部長得依國家利益考量允許執照的發給與否；已獲執照之廠商，貿工部長得於任何時間檢察有關文件、生產品與生產器具；資本額少於 10 萬的小型製造工業、全職工人少於 25 人的工廠得豁免申請執照。³⁴

在馬來人以國家強制力推行一系列的國家經濟、文化政策，足見華人族群的地位正被強勢的馬來民族主義給弱化，一個邁向以馬來人為主的一元政治、經濟與文化結構的社會正在成形。

(四) 區域社群主義

英國向馬來社會的統治階層介紹土地管理、法律概念、稅收制度，其用意只是作為殖民經濟發展的基礎建設，對於馬來社會傳統結構並未作改變，諸如未提升奴隸解放後的地位，保留以往 Yang Di-pertuan 制度，使傳統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關係保留下來；此外，許多英國引進的運輸與通訊設備，並沒有與多數居住鄉村的馬來人所依賴的溝通媒介——河流沿岸有交

年共有 3101 人被拘留、448 人被監禁。顯見政府防範反政府行動之積極。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Affairs 1983-Parties and Revolutionary Movement, Californi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3, p. 195.

³² 丘光耀，〈雙重文化霸權下的馬來西亞華人政治與文化認同新探〉《海華與東南亞研究》，第 3 卷，第 4 期，2003，頁 95~120。

³³ 李一平，〈90 年代以來馬來西亞的華巫族群關係〉《第七屆臺灣歷史與文化研討會》，台中：東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2004，頁 7-1~7-11。

³⁴ 謝詩堅，《馬來西亞華人政治思潮》，檳城：友達，1994，頁 282~283。

集。³⁵因此，對原本很少參與城市活動的馬來人而言，許多新的公共設施與資訊很難在多數的馬來鄉村地區流通。城市對許多鄉村的馬來人而言是新的事物，華人與印度人才是在城市人口中主要構成者，支配城市所有的經濟活動，很難有馬來城市居民插手的空間。³⁶特別是吉蘭丹、吉打、丁加奴等頑強抗拒英國統治，較晚才「完全」受控英國的三個北方馬來州，與霹靂、彭亨、柔佛等馬來州的發展相比，直到 1920 年代的發展還是相當遲緩。這可從丁加奴、吉打與吉蘭丹為傳統伊斯蘭宗教教育與文化重地的特色窺見。³⁷這不僅是城市裡印、華、巫經濟差距的由來，也是馬來人彼此間城鄉差距產生的原因。

1800 年到 1941 年英國在印度實行土地佔有制度，鼓勵印度人大地主大量兼併土地，造成農村許多賤民階級（the untouchable caste）喪失土地而淪為佃農，受高利貸之壓迫。因為農村剝削所造成的低生產率與高失業率，適逢英國極力開發馬來亞經濟政策之實行，印度人在 1860 年代大量被引進馬來亞從事橡膠工人之勞動。同華人一樣，印度人也透過所謂客頭招募同鄉移民進入馬來亞，然而多來自南印度的印度勞工，也有移入的地區、職業、語言、宗教信仰以及教育不同而分派的現象，這些因素阻礙二次大戰以前印度人無法成為具有和諧一致的力量。³⁸

華人開始在馬來西亞歷史扮演重要角色，是在 1786 年英國租得檳榔嶼以及 1819 年英國人萊佛士開拓新加坡之後。³⁹但是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華人社會，基本上是一個幫派林立、相互衝突與調和的社會，各幫的血緣、地緣與業緣組織，亦是幫派社會的一個反應，雖說華人社會已有超幫派組織和超幫派領導人物出現，但華族社會基本上仍是幫權沖激的幫派社會。

³⁵ Khoo Kay Kim, *Malay Society-Transformation & Democratisation*, Malaysia: Pelanduk Publication, 1995, p. 162~164.

³⁶ Khoo Kay Kim, p. 164.

³⁷ Khoo Kay Kim, p. 161.

³⁸ C.F. Yong, *The Origins of Malayan Communism*, South Seas Society, Singapore, 1997, p. 2.

³⁹ 李亦園，《一個移植的市鎮—馬來亞華人市鎮生活的調查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70，頁 10。

雖然 1920 年代到 1930 年代馬來亞華人民族主義之盛行，但並未因此而使華人幫派社會的傳統稍有削減的趨向，不論是國民黨或是中華總商會的組織與結構，都反應華人幫會運作的色彩，不論自同盟會會務實際上是由各幫人士自行推導，中華總商會的分幫選舉、董事的分配都是由幫來主導，會長由閩廣兩幫輪流擔任，無疑是幫派社會的表現。⁴⁰

四、戰前馬來亞社會運動的發展

二次世界大戰前，馬華族群均有不同層面的社會運動潮流，這些社會運動經常反應出其反殖、啓蒙與救國的性質，這些社會運動的發生，除間接英國殖民統治的一些問題，也間接顯示馬華社會本身所存在的一些問題。

以往研究東南亞學者在討論馬來人的民族性，常認為馬來人是生性極度保守、對激進思想毫無興趣、懶惰、被動、只求自給自足的民族；⁴¹其民族主義意識的崛起與高漲，是經過 1942 年到 1945 年日軍佔領時期，刻意製造馬來「反英」、「反華」意識的結果。⁴²換言之，馬來人在戰前與英國人的相處是無矛盾而和諧的。這種將馬來人看成一整塊的看法，忽略了馬來社會存在許多歧異而分立的個體。如同學界對華人社會因為祖籍、語言不同而有不同的認同與社群歸屬等現象的了解一樣，馬來族群內部的歧異也表現在不同階層、地域的馬來人會有不同的民族意識與認同，而牽動影響馬來人之間階級與地域的你我區分的背後，是馬來人對伊斯蘭教在信仰思想上的分歧所致。

伊斯蘭教是馬來社會很重要的文化建構的部份，從 1900 年到 1941 年馬來亞的伊斯蘭教如其多元政體一樣發展分歧。首先，一個虔誠的穆斯林幾乎會使自己的完全符合伊斯蘭原始教義與規範的要求，但是當伊斯

⁴⁰ 楊進發，《戰前星華社會結構與領導層初探》，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學會，1977，頁 2~3。

⁴¹ 張虎，《早期馬共歷史之分析研究》，台北：黎明，1980，頁 12~13。

⁴² 楊建成，《華人與馬來亞之建國》，台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6，頁 99~106。

蘭教傳入非阿拉伯社會的馬來亞，馬來穆斯林會將伊斯蘭融入某些本土風俗習慣來加以信仰。⁴³故傳入馬來半島的伊斯蘭透過社會階層化以後，呈現兩種面貌：一為正統遜尼主義（Sunnism），遵奉經典並深具入世禁慾主義、倫理取向；另一為蘇非主義（Sufism），是泛神論、聖者崇拜、講究出世密契主義、修行取向；遜尼主義以城市工商階級、知識份子為主，蘇非主義信仰者以鄉村農民及游牧民為主。⁴⁴從兩個支派所吸收的信徒身份，可知馬來人在信仰派別不同之時，已同時意味階層上的區別。再者，當英國在 1919 年完成整個馬來半島的控制，因為靠進泰國南部的幾個馬來州如吉蘭丹、吉打、丁加奴等因為較晚才「完全」接受英國「保護」，故其政治、經濟與教育上的發展也較其它馬來州緩慢，這可從馬來各州教育受英管理程度之深淺來看。傳統的馬來學校有 rakayat 與 pondok 兩種，rakayat 學校是由村中長者任管理委員，依照英國的教育部門規定行事；pondok 學校是幫助伊斯蘭教繼續在馬來社會興旺、傳承下去的媒介，多半由伊斯蘭學者開設，是私人的宗教學校，而 pondok 學校在吉打跟吉蘭丹相當普遍，柔佛就不流行 pondok 學校，其伊斯蘭學校的總管理者伊斯蘭部是直接隸屬教育部的督察員與註冊員手中。⁴⁵從吉打、吉蘭丹、柔佛的 rakayat 學校與 pondok 學校普遍程度的高低，直接反應出英國在這些馬來州控制制度的深淺不一，也間接反應了伊斯蘭文化發展程度的不一致。馬來社會受到英國不同程度的控制與伊斯蘭文化發展的不一致等一體兩面的現象，也反應在馬來聯邦與馬來屬邦底下各州的管理體系對伊斯蘭強調的程度不一，像是在丁加奴，烏拉瑪（Ulama）⁴⁶在管理體系的運作中影響力很大；⁴⁷烏拉瑪被賦予的神性在各

⁴³ Mak Lau Fong, *Islamization in Southeast Asia*, Taipei: Asia-Pacific Research Program, Academia Sinica, 2002, p.22.

⁴⁴ 蔡源林，〈從伊斯蘭法的公共論述看馬來西亞社群主義的建構〉《亞太研究論壇》，第 23 期，2004，頁 15~36。

⁴⁵ Khoo Kay Kim, pp.169~172.

⁴⁶ 烏拉瑪是熟悉伊斯蘭教經典與教義規範的宗教學者，特別指留學伊朗、土耳其、埃及等中東國家回國的人。

⁴⁷ Khoo Kay Kim, pp.205~206.

州也有不同的程度，有些馬來州甚至擴大成爲世系，成爲堅不可破的社會階級。⁴⁸

馬來亞雖然自英國殖民統治時代以來，「馬來優先」的政策一直爲施政主流，受英語教育的馬來土著不是擔任政府公職，就是不會從事反政府的活動。⁴⁹ 但並不代表所有馬來人都是傾向英國立場。雖然 1874 年到 20 世紀初期，大多數的馬來人還沒有意識到要與城市的外來移民相並列，但是這種警覺很快就由受英國影響較少而傳統伊斯蘭文化深厚的吉蘭丹、吉打、丁加奴等泰馬邊區馬來州教育界所啓蒙，從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出現了以穆斯林知識份子爲領導的馬來啓蒙運動。這些地區是馬來土著提倡宗教改革運動的重地，也是頑強反抗英國殖民統治的中心，更是伊斯蘭宗教教育的重地。在 1920 年代早期一群從中東學成回國的馬來學生群體，察覺馬來人與其它族群比較之下顯現的落後與差異。特別在教育方面，努力告知馬來人不主動、過份保守的危險，1930 年代馬來人則意識到不同種族間領導模式的差異，不同領導人的不同領導模式，特別是非馬來人對馬來人在經濟上的支配行爲，馬來人需要起來捍衛自己的權益。⁵⁰ 許多馬來社會改革運動的發起以及攻擊保守主義的風潮，多半來自馬來人本土教育者的力量。

領導改革啓蒙運動的馬來本土教育者，他們是本土的馬來學校教師與培育出來的青年學生，主要是 rakayat 學校，另有留學中東回教國家的學生。馬來社會開始出現關心馬來人「落後」問題的聲音，是 1906 年新加坡出版的刊物《領導者》(Al-Imam)，該刊物表達馬來人對英國人殖民的不滿，抨擊英國人自以爲他們的宗教與文明很高尚，同時對馬來人在整個馬來亞的經濟與社會處於弱勢的地位感到憂心。1918 年馬來社會再出現與《領導者》相同關懷的刊物《守護者》(Pengasuh)，該刊物呼籲馬來半島須要在政治上

⁴⁸ Mak Lau Fong, *Islamization in Southeast Asia*, Taipei: Asia-Pacific Research Program, Academia Sinica, 2002, p. 12.

⁴⁹ Khoo Kay Kim, pp. 158~166.

⁵⁰ Khoo Kay Kim, pp. 176~179.

統一，馬來人必須拋棄保守主義的性格，勇敢與「外來者」競爭。1924 年到 1932 年，有穆斯林知識份子 Mohamed bin Dato Muda linggi 主編的刊物《教師雜誌》(Majallah Guru) 發行，以關心馬來教育、社會與經濟問題為主旨。從該刊物的投稿者身份來看，如 Dato Haji Md.Sidin bin Haji Rashad 本身在伊斯蘭宗教學校從事教職 30 年，他所撰寫的文章目的在喚醒沉睡的馬來人，力促馬來人發展經濟活動；再如 Abdul Hadi bin Haji Hasan 教授馬來歷史，非常關心馬來人的教育問題；Ahmad bin Abdullah (Ahmad Bakhtiar) 有許多關注馬來人過去歷史的著作，他的文章極力強調馬來族的光榮；又如 Haji Md. Yusof bin Ahmad 本身在馬來聯邦為森美蘭的州行政事務會的成員，他的文章極力鼓吹馬來人多涉足政治經濟的活動。⁵¹

在 1926 年至 1927 年間，有名為「忠誠青年」(Setiawan Belia) 的藝術社團成立，它是由 Asaad Shukri, Kadir Adabi 與 Yussof Hilmi 三名吉蘭丹的馬來穆斯林青年組成，熱衷政治活動，但社團裡其它成員不太願意涉及政治，故 1929 年三名青年為充分表達政治思想，另組「大地之子俱樂部」(Putera Kelab) 散布傳單，警告代表真主守護馬來人的王 Rakayat 將被取代。1930 年 Asaad Shukri 再創一份 Kenchana 的刊物，原本刊物的主題是討論馬來婦女，後漸擴大至整個吉蘭丹的社會問題，隔年即遭英國干涉而停辦。⁵²社團「忠誠青年」與刊物 Kenchana 顯示了馬來人在 1920 年代末期對馬來社會的政治、社會問題已有醒覺，他們批評英國對馬來人的殖民，試圖破壞馬來人原有的統治團體，1929 年「大地之子俱樂部」散發的傳單內容即可說明。

1926 至 1927 年間在吉蘭丹成立的 Setiawan Belia 在二次世界大戰前夕 (1937 年) 擴大為 the Kesatuan Melayu Muda (KMM, 馬來亞青年聯盟)，是馬來社會第一個激進政黨。該政黨強烈抨擊與馬來資產階級、官僚階級「共治」的英國統治，批評華人與印度人這些「外來者」對馬來亞經濟的獨佔與壟

⁵¹ Khoo Kay Kim, pp.180~188.

⁵² Khoo Kay Kim, pp.184~185.

斷，該黨目的是追求馬來亞獨立，與印尼構成大印度尼西亞。⁵³馬來亞青年聯盟是個「反殖」、「親印尼」、「排華」意識的激進政黨，它的成員就包含了前述的Setiawan Belia與Putera Kelab兩團體的成員Asaad Shukri,Kadir Adabi兩位吉蘭丹穆斯林青年，這意味著伊斯蘭文化傳統重地的吉蘭丹是馬來政治性社會運動的領航者。

而印度人是由受英國教育的中產階級知識份子領導，在1915年新加坡印度傭兵暴動可視為反英反殖民的一股激進潮流的萌芽。⁵⁴但是在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在馬來亞的印度移民有政治運動的發展，較早由印度中產階級份子（受過英語教育的專業人士，如商人、律師、醫生、教師、調查員）於1906年在太平發起印度聯合公會運動（The Indian Association Movement），1909年擴及吉隆坡，1920年代印度聯合公會成爲一個有力量的壓力團體，向馬來聯邦以及海峽殖民地立法機構爭取參政權利。甚至於1936年，在印度聯合工會的基礎上再成立馬來亞中央印度聯合公會(the Central Indian Association of Malaya, CIAM)，涉及橡膠印度勞工聯合會的組織與公民權爭取事宜，成爲一支重要的政治壓力團體。另一場以非常手段進行的政治叛亂運動，是發生在1915年2月，新加坡的印度傭兵結合在新加坡穆斯林的叛亂。該場叛亂除了印度傭兵本身不滿於英國不公平的待遇之外，尚受到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英國襲擊土耳其穆斯林影響有關，由於缺乏基曾層的大眾支持，該場叛亂只爲期10天。⁵⁵

基本上，1919年以前的印度群體是沉默的與和平的，因爲一次世界大戰的暴發，讓中產階級馬來亞印度人的文化、宗教產生萌芽的機會，只是反英與民族主義尙待成形。⁵⁶

在1900年至1941年的華人社會當中，涉及政治性質的社會運動一直

⁵³ Cheah Boon Kheng, *Red Star over Malaya: Resistance and Social Conflict during and aft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1941~1946*,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2.

⁵⁴ C. F. Yong, ,p.10.

⁵⁵ C.F.Yong ,pp.3~4.

⁵⁶ C.F.Yong,pp.4~5.

在延續發展，即使英國自 1919 年開始加強對華人政治活動的監控與壓制，依然無法抑止華人的政治社會運動。而華人的政治性社會運動多半與中國的政治發展有關，並且隨華人分歧的社群性組織而有不同屬性的思想潮流。

若以二分法來區分華人，可先以出生中國而移民馬來亞的華人和出生馬來亞的峇峇與娘惹之間，存在傾向中國與傾向馬來亞的國家認同差異，出生馬來亞的華人相當積極爭取公民權與參政權。⁵⁷在海峽殖民地華人，1900 年林文慶（Lin Boon Kheng）、宋旺相（Song Ong Siang）等人在新加坡成立「海峽華人英國協會」（SCBA, the Singapore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其該協會宗旨不外乎要效忠英國，並要透過合法、法律的管道積極向英國爭取海峽華人應得的權利，努力增進海峽華人的知識、道德，SCBA 在 1901 年隨即於馬六甲和檳榔嶼成立支部。受過英語教育的 Baba 如林文慶等人，他們的專業知識、語言及領導能力加上親英立場，不少人均被英國指定為海峽殖民地與馬來聯邦立法政務會與聯邦議會的成員。⁵⁸在 1920 年代，英國同意成立選舉委員會，徵詢相關的議會改革意見，海峽華人對此大感興趣。但是海峽殖民地的立法院後來擴大官方以及非官方的委員名額，然而華人依然佔少數，這就引起陳禎祿的批評。⁵⁹1931 年 SCBA 聯合了海峽殖民地所有支部共同向殖民政府提出議會改革的備忘錄，要求在海峽殖民地每個地區增加華人在立法政務會的人數，非官方華人會員數目再增調。⁶⁰然 SCBA 這項要求實際已違反了英國馬來優先的政策，會引發馬來統治者的疑慮，更鑑於中國與華人關係之密切，終為英方猜忌而不被官方採納。林文慶、陳禎祿這類的海峽華人企圖透過合法的、與統治者合作的方式來獲取政治上的權利，基本上並不反英，其對國家的認同是傾向於認同馬來亞。

另一類從事不被英國政府認可的華人非法政治活動，最早應為 19 世紀

⁵⁷ Cheah Boon Kheng, *the Masked Comrades-a Study of the Communist United Front in Malaya, 1945~1948*, Singapore: 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 1979, p.11.

⁵⁸ Oong Hak Ching, pp.34~35. C. F. Yong and R. B. McKenna, *the Kuomintang Movement in British Malaya, 1912~1949*,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3.

⁵⁹ Oong Hak Ching ,pp.35~36

⁶⁰ Oong Hak Ching ,pp.38~39.

末以來康有為與梁啟超領導的保皇運動，與隨後孫中山領導的反清革命運動，保皇運動與革命運動帶動馬來亞華人的政治意識萌芽，使得 20 世紀如國民黨與共產黨在馬來亞的活動，均讓馬來亞華人的民族主義作出積極又強烈的回應。而不同祖籍、方言讓華人已經處於分裂的幫派社會，再因為不同的政治認同而加快分歧的速度。

不論是康有為的保皇運動或孫中山的革命運動，他們在東南亞的活動都是從新加坡開始的。1898 年由於在中國本土進行的百日維新失敗，康、梁二人流亡海外宣傳政治改革挽救中國的保皇運動，首在新加坡創辦報紙（天南新報）、勤學社與辦華校來影響華人、爭取華人支持，而邱菽園、林文慶等海峽殖民地華人都是支持者。⁶¹另一方面，反清革命運動在馬來亞的活動最先是尤烈設立中和堂，奠定華人私會黨與下層社會的革命基礎開始，而後 1903 年新加坡成立革命活動的掩護組織—讀書社，具備傳播革命理念與招募會員的功能，當 1904 年新嘉坡華人張楚楠、張永福創辦圖南日報，宣傳更具煽動性反清言論，但並不為當時保守且支持保皇的華人資產階級所喜，雖然孫中山推動 1906 年中國革命同盟會在新加坡成立，然作為中國革命同盟會「外圍組織」的讀書社到 1908 年才在馬來半島發展起來，如在彭亨的關丹（Kuantan）也成立了讀書社，另外書報社也是革命運動宣傳革命思想的場所。⁶²兩派運動的勢力在 1909 年在清朝無意真正施行君主立憲的事件後有了逆轉，華人予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始有較多的支持，直到 1919 年華人受中國五四運動影響所激起的強烈民族情感，在無政府主義與共產主義隨五四運動救國風潮進入馬來亞以後，才使華人社會在政治思想上真正出現左派與右派的對立。

1919 年於五四運動潮流中出現的無政府共產主義正式代表著馬來亞左派政治運動的開始，並且是 1921 年馬來亞共產運動開始的先驅。3 月，幾

⁶¹ 崔貴強，〈華人的政治意識與政治組織〉，林水椽、駱靜山合編，《馬來西亞華人史》，雪蘭莪：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1984，頁 52-53。

⁶² C. F. Yong and R. B. McKenna, *the Kuomintang Movement in British Malaya, 1912~1949*,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4.

個中國無政府主義知識份子王雨亭（Wang Yu-ting）、林青山（Lin Ching-san）、林劍魂（Lin Chien-hun）、羅文興（Lo Wen-hsin）與 Goh Tun-ban 在吉隆坡創辦「益群報」，開始發表以中國政治為議題的激進言論，他們大多數是在中國受過大學教育的知識份子，在馬來亞多擔任記者與華校教師，益群報的創辦宗旨在提供中國社會的積弱與不振的辦法，要喚起海外華人新的道德標準與發展經濟事業，由於國民黨在經費上支助益群報，故常被認為益群報是國民黨領導下的機關報之一。⁶³然這股以益群報為宣傳無政府主義救國思想，實際上卻陸續為無政府共產主義份子、社會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支配編輯職務，1921 年以後中國共產主義份子則透過益群報、二大華人學校（如中華學校、平民夜校）、加入國民黨等管道為主要散播思想和擴張勢力的媒介。⁶⁴由 1924 年中國境內容共政策的施行，許多國民黨舊支部重新成立以及新成立的副支部在馬來屬邦鄉村地區出現；但是，國民黨舊支部與副支部在馬來亞國民黨穩健派清黨之前後，激進左派份子依然控制大部份的國民黨支部，尤其是附屬支部，他們多與夜校學生和工人團體有頻繁連絡，這也是 1928 年南洋共產黨成立之前，左派份子得以活動的原因。⁶⁵

實際上，馬來亞的共產主義運動在 1930 年以前是國民黨活動的性質一樣，都是中國政治活動的一種，不論在組織成員或運動目標都是以中國利益為考量。但是 1930 年由共產國際接手指導馬來亞共產黨成立以後，馬來亞的共產主義的性質，已經是一個在革命目的與組織成員都以馬來亞這塊土地為主、加強殖民地人民反英帝國主義的活動與意識、強調去中國化色彩，這種馬來亞傾向的政治認同持續至 1940 年太平洋戰爭發生為止。

二次戰前的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份子，在 1926 年以前的馬來亞地區共產黨所發動的幾場著名的革命活動，主要由中國出生的海南籍馬來亞華人

⁶³ C. F. Yong, *the Origins of Malayan Communism*, Singapore: South Seas Society, 1997, p.20.

⁶⁴ C. F. Yong, *the Origins of Malayan Communism*, Singapore: South Seas Society, 1997, p.29~35.

⁶⁵ C.F. Yong and R.B. McKenna, *The Kuomintang Movement in British Malaya, 1912~1949*,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Singapore, 1990, pp.83~90.

民族主義者、印尼共產黨人達索諾（Darsono）與陳馬六甲（Tan Malaka）、亞利明（Alimin）、荷蘭共產黨人史聶夫立（Sneevkiet）、印度人 M.N.Roy、胡志明等人主導。根據 Gene Z. Hanrahan，印尼共產黨人在 1924 年停駐新加坡期間，曾試圖動員馬來人加入共產主義活動，1925 年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發動暴亂奪權失敗，陳馬六甲、穆索（Musso）、亞利明等人都逃至新加坡，因語言與馬來人無障礙，再試圖動員馬來人，但效果非常消極，遠比不上中共動員海外華人的成效。故 1925 年陳馬六甲說服在廣東的中共領導幹部派人去滲透新加坡左派，而 Fu Ta-ching（傅大慶）就被派去新加坡影響華人與印度尼西亞的革命黨員，因此，陳馬六甲將失敗原因歸咎於馬來人的慵懶，認為只有華人有希望。⁶⁶

在馬來亞的共產黨最基本的強調是滲透具有激進傾向的中低學校的青年與學生，第一個共黨的學生外圍組織約在 1926 年共黨青年聯盟（a Communist Youth League）在新加坡設立，之後涉及馬來半島，私人資金的華人學校是最早被滲透的對象，這些學校的教師多是激烈的左派份子，共產黨也設立夜校，藉此機會滲透學生，從學生中發展影響力與幹部。在工人方面，經常是散發「建立蘇維埃」或「工人該醒了」等之類的傳單與標語，許多工人被組織起來，並發動工人示威罷工的騷亂暴動，進行一場宛如中國人式的革命，但是當英國展開鎮壓行動時，一系列的示威罷工運動又歸於失敗。⁶⁷故在 1940 年之前，共產黨的社會運動形式多半以學生和工人示威或罷工運動呈現，在馬來人的動員方面並沒有多大的斬獲，即使印尼共黨曾經努力。

1940 年 7 月到 9 月，馬共總書記萊特（Lai Teck）命令馬共隱藏反英目的，停止所有形式的反英動作，推動助英與中國抗日，以合法手段團結抗

⁶⁶ Gene Z. Hanrahan, *The Communist Struggle in Malaya*,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1971, pp.29~30.

⁶⁷ Gene Z. Hanrahan, *The Communist Struggle in Malaya*,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1971, p.42.

日國家幫助華人抗日，藉適當時機獲得英物資上的援助以蘊釀革命勢力。⁶⁸

五、結論

當我們對英國的統治政策運作與馬華社會變化的分析，發覺構成 1900 年至 1941 年的馬來亞社會運動的發展歷史中，馬來穆斯林知識份子所具有的反殖反帝、啓蒙改革的民族主義精神並不輸給活躍的華人民族主義者。在呈現馬華各種社會運動的同時，我們也察覺馬華內部因地域、語言、職業、文化的差異而形成多樣分立的社群概念，也深深反映在社會運動的成員結構中。此外，從這些馬華的社會運動的訴求與內容，也可發覺馬來人對華人其實已經存在敵意與恐懼，但華人對於馬來人的敵視卻毫不自覺，還是熱情參與跟中國有關的政治活動，而被認為不屬於馬來亞這國家的一份子，埋下戰後馬華種族衝突的最根本的導火線。

⁶⁸ Yoji Akashi, "Lai Teck,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1939~1947,"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Vol:49, 1994, pp.57~113.

參考書目

專書

- Victor G. Kiernan 著、陳正國譯，《人類的主人－歐洲帝國時期對其他文化的態度》，台北：麥田，2001年。
- Victor Purcell 著、張奕善譯，《近代馬來亞華人》，台北：商務，1967年。
- 丘光耀，〈雙重文化霸權下的馬來西亞華人政治與文化認同新探〉《海華與東南亞研究》，第3卷，第4期，2003年，頁95~120。
- 何修明，《社會運動概論》，台北：三民，2005年。
- 李一平，〈90年代以來馬來西亞的華巫族群關係〉《第七屆臺灣歷史與文化研討會》，台中：東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2004年，頁7-1~7-11。
- 李亦園，《一個移植的市鎮－馬來亞華入市鎮生活的調查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70年。
- 崔貴強，〈華人的政治意識與政治組織〉，林水椽、駱靜山合編，《馬來西亞華人史》，雪蘭莪：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1984年，頁52~53。
- 張虎，《早期馬共歷史之分析研究》，台北：黎明，1980年。
- 郭昌泰，〈1973年至1986年智利社會運動之研究〉，台北：淡江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年。
- 陳鴻瑜，《東南亞各國的政治與外交政策》，台北：渤海堂，1992年。
- 楊建成，《華人與馬來亞之建國》，台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76年。
- 楊進發，《戰前星華社會結構與領導層初探》，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學會，1977年。
- 蔡源林，〈從伊斯蘭法的公共論述看馬來西亞社群主義的建構〉《亞太研究論壇》，第23期，2004年，頁15~36。
- 謝詩堅，《馬來西亞華人政治思潮》，檳城：友達，1994年。

外文專書

“Malaya’s Race Problem,”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XXIV:9,1958,p.278.

Barbara Watson Andaya and Leonard Y. Andaya,*A History of Malaysia*,Palgrave,2001.

C. F. Yong,*The Origins of Malayan Communism*,Singapore:South Seas Society,1997.

C.F.Yong and R.B.McKenna,*The Kuomintang Movement in British Malaya,1912~1949*,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Singapore,1990.

Cheah Boon Kheng,*Red Star over Malaya:Resistance and Social Conflict during and aft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1941~1946*,Singapore: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2003.

Cheah Boon Kheng,*The Masked Comrades-a Study of the Communist United Front in Malaya,1945~1948*,Singapore: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1979.

Edgar F. Borgatta,Rhonda J. V. Montgomery,*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New York:Macmillan Reference,2000.

Gene Z. Hanrahan,*The Communist Struggle in Malaya*,Kuala Lumpur:University of

Khoo Kay Kim,*Malay*

Society-Transformation Democratisation,Malaysia:Pelanduk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Ltd,Londen,1964.

Mak Lau Fong,*Islamization in Southeast Asia*,Taipei:Asia-Pacific Research Program,Academia Sinica,2002.

Malaya,1971.

Nicholas Tarling 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Volume Three),

Ooi Jin-bee,*Land,People and Economy in Malaya*,Longmans, Green and Co

Oong Hak Ching,*Chinese Politics in Malaya 1942~55 –The Dynamics of British Policy*,Penerbit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Bangi,2000.

Politics,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1994.

Publication,1995.

Sidney Tarrow,*Power in Movement:Social Movements,Collective Action and*

Simon C.Smith,*British Relations with the Malay Rulers from Decentralization*

to Malayan Independence, 1930~1957,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uala Lumpur, 1995.

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Affairs 1983-Parties and Revolutionary Movement, Californi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3.

Yoji Akashi, "Lai Teck,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1939~1947,"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Vol:49, 1994, pp.57~113.